



当代 诗坛“刀锋”透视

刘波 著

本书是一部通过个案研究对当代先锋诗歌进行整体宏观的美学考察。从朦胧诗人一到“第三代”诗人，“中生代”诗人，再到70后诗人，本书对这些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诗人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既富有诗教批评的理性情调，又不乏学术研究的理性品质。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就是先锋诗歌在语言创造与思想发展上的双重审美历程。作者对走在诗坛最前沿且占据了先锋诗坛边界的话人所作的重新解读，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研究的创造精神和审美价值。

「冷板凳」学术书系
罗振亚 主编



当代 诗坛“刀锋”透视

刘波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 / 刘波著. -- 保定 :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4.5
(“冷板凳”学术书系 / 罗振亚主编)
ISBN 978-7-5666-0587-0

I. ①当… II. ①刘…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②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3662号



责任编辑：杨显硕

装帧设计：赵 谦

责任印制：靳云飞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1 / 16 (710mm × 1000mm)

字数：270千字

印张：19.25

版次：2014年5月第1版

印次：2014年5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5666-0587-0

定价：42.00元

总 序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甘坐十年“冷板凳”的学者，确实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学者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即便心里很想先沉下来，把书读好，然后再回过头来扎实地做文章；但是囿于各种量化的评价指标和功利性要求，这种大环境似乎也不允许他们依循自己的理想去做“慢”的学问。于是，快速写作和高端发表，就成了当下学术的常态。然而，不管社会怎样喧嚣，时代如何疯狂，学术之事，归根结底不是一场热闹的狂欢，它仍需要学者们持守一份宁静的心态，需要耐得住长久的寂寞，如此方可靠近学问的真谛。总之，坐“冷板凳”，还是我们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前提，也是学问通往一种深度和境界的保证。

正因如此，我觉得在当下出版一套甘坐“冷板凳”的年轻学者的著作，就显得尤为必要，意义非凡。而“冷板凳”这三字，绝非我一时所想，其实它早有一段渊源。记得是 2002 年秋天，我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一次珞珈山庄同门聚会上，导师龙泉明先生兴奋而庄重地和我们说，他要主编一套研究丛书，让自己弟子们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以集束的方式面世。而后又不止一次谈及这一设想，并从期望弟子能在孤独中找到真正精神归宿的角度出发，寓意深刻地将之命名为“冷板凳系列丛书”，联系好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师兄弟们很受鼓舞，我也在盼着自己的论文忝列其中出版的日子。谁也想不到的是，2003 年 7 月恩师被确诊为肝癌，一病不起，次年初即离开人世，弟子们除了悲恸，还是悲恸。丛书出版之事只能搁浅。而

后,每逢念起此事,我都深感老师的期望之重,也品味到了遗憾滋味的折磨。恰巧这次河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杨显硕先生希望我能主编一套当代诗歌研究方面的专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弥补遗憾的机会,所以我打从心里感激编辑。

编辑明确要求丛书收入的一定是专著,而不是评论和论文集,这当是出版社仍在寻求学术理想的体现,也符合龙老师当年的期望。1990年代以来,诗歌文体逐渐边缘化了,而诗歌研究依靠如今的学术体制虽然能获得一些生机,但在众多学科里仍然属于冷门。现在能沉得住气专注于研究诗歌的,则可视为这个时代做孤独学术的见证。当编辑跟我交流和沟通时,我瞬间就想到了这套诗学研究丛书可以用“冷板凳”来命名。一方面,是完成龙泉明先生当年的未竟之愿,以另一种形式怀念他,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另一方面,也想以此命名倡导甘坐“冷板凳”的学术精神,以之鞭策自己,激励更多年轻的学者敛心静气地做学问。

纳入“冷板凳”学术书系的几本专著,都是对当代诗歌或局部或整体的研究,且各有侧重,有现象研讨和个案批评,有诗歌断代史的梳理,还有对诗歌精神的探究。霍俊明的《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考察》,是一部系统论述新世纪各种诗歌现象与问题的诗学专著。他以田野作业、微观阅读和现象学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诸多诗歌问题予以别开生面又深具发现力的辨析与省思。尤其是对新世纪以来纷繁的诗歌现象、诗歌生态和诗人的精神境遇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整体性分析与总结。刘波的《当代诗坛“刀锋”透视》,则是一部通过个案批评对当代先锋诗坛进行整体扫描的诗学著作。从《今天》派、朦胧诗,到“第三代”诗人、“中生代诗人”,再到70后诗人,作者对这些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诗人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既富有诗歌批评的感性情怀,又不乏学术研究的理性品质。他的另一本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是对“第三代”先锋诗潮研究的力作。它从“第三代”诗人的理想主义气质和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入手,解析这一代诗人的情感和创作心态,还原他们的生活与交往现场,注重从各种角度动态性地透视这一先锋诗歌运动。它从诗学和非诗学两个层面来重新

审视“第三代”诗歌运动，尤其是对运动结束后诗人们的持续性创作做追踪考查，以挖掘“第三代”诗歌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视角独特。我的《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企望探讨民间写作、知性写作、70后诗歌、女性主义诗歌等主要群落间的承续与变异、每个群落的不同特质，解析先锋诗歌的裂变与转型、生产与传播方式、诗学主张和叙事策略，总结其内在流变规律，特别是对于坚、翟永明、西川等代表性诗人的解剖，以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到实处，从而完成1990年代的先锋诗潮的断代诗歌发展史建构。

国内已有数种“新诗研究与批评”之类的丛书出版，并且各具特色，不乏精品，只是多为评论结集，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其略显零散、琐碎，在主题上尚不够集中。这套“冷板凳”学术书系也是立足于当代诗歌，但力求每一本都主题突出，尽量使研究趋于全面系统。在目前，肯于大规模地出版系列诗歌研究著作的出版社并不多，它既需要眼光，又需要魄力。从这个向度上说，河北大学出版社集束性地推出“冷板凳”学术书系，就功德无量，价值独具，它是对浮躁世俗学术研究怪象的一种扼制，更可视为对理想主义精神坚守的一种象征。

罗振亚

2013年12月

目 录

绪论	(1)
一、召唤当代诗歌精神	(1)
二、尊严写作的日常化	(5)
三、表达的难度与思想的深度	(9)
第一章 集体主义时代的象征美学	(14)
第一节 食指：苦难审视与自我拯救	(15)
一、吹响时代的号角	(15)
二、一种美学转折的发生	(19)
三、命运感的自然流露	(23)
第二节 北岛：为当代诗歌建立启蒙的传统	(28)
一、激昂的“回答”时代	(29)
二、失败主义的诗歌理想	(33)
三、转型后的写作境界	(38)
第三节 多多：手艺人的悲剧意识和尊严写作	(43)
一、手艺人的张力和创造性	(44)
二、在否定中靠近和领受诗意	(48)
三、爱的视野与悲剧性书写	(54)
第四节 王小妮：为日常体验和真挚抒写作证	(58)
一、低调而独特的“个人化写作”	(59)
二、从写诗中找到活着的理由	(63)

三、越过困境,走向开阔	(68)
第二章 激情与灿烂共生的汉语之魅 (73)	
第一节 于坚:拙朴而大气的诗意建构	(74)
一、民间立场下的常识书写	(74)
二、还原语言之后入心的表达	(77)
三、叙事策略与“反诗意”	(81)
四、古典传统、西方精神与批判意识	(84)
五、持续性写作的意义	(87)
第二节 王家新:承担意识、批判精神与日常逻辑	(90)
一、灵魂的审判	(91)
二、对话思想性	(95)
三、从一种日常到另一种日常	(98)
四、内在的诗性选择	(102)
第三节 翟永明:从女性写作走出的诗之大道	(106)
一、修辞的减法:从繁复到简洁	(106)
二、介入现实是诗人的另一种责任	(110)
三、从独白到对话:一道敞开自我的写作之门	(113)
四、日常、传统、古意之变皆通向诗之“真理”	(117)
第四节 西川:诗歌思想者的独白与对话	(121)
一、代表作时代回不去了	(121)
二、先锋、现代还是传统?	(126)
三、什么样的诗意属于西川?	(131)
第五节 李亚伟:想象力冒险的诗歌传奇	(136)
一、烈酒与行走的青春反叛	(137)
二、天才与个性化的语言冒险	(139)
三、在想象中重铸极致的诗意	(142)
四、回归现实与“寂寞处的响动”	(144)
五、诗意坚守者的缓慢释放	(146)

第三章 消费主义时代的思想和诗意	(151)
第一节 臧棣：“新纯诗”精神与敞开的路径	(152)
一、技艺与“新纯诗”立场意味着什么？	(152)
二、想象力与修辞练习	(156)
三、在坚持中冒险出击	(160)
四、如何处理现实与时代的命题	(163)
第二节 伊沙：口语、反抒情与冒犯式书写	(166)
一、如何处理口语和先锋的关系	(167)
二、当写诗成为一种日常功课	(171)
三、反抒情的立场与干净之诗	(174)
四、伊沙式诗歌心理学	(177)
第三节 余怒：当代汉语诗歌的神秘魔方	(181)
一、当困惑成为一种诗歌现象	(182)
二、陌生化的诗意图就在那张力呈现之处	(186)
三、荒谬的美学和不信任的误读	(190)
四、从不及物到及物的悄然转变	(194)
第四节 陈先发：以传统对接当下的先锋	(198)
一、复旦校园诗人的前期画像	(199)
二、在传统里获得先锋精神	(204)
三、写好诗就是一种自我折磨	(209)
第五节 蓝蓝：在介入中寻求诗的真谛	(213)
一、由体量和气场决定的诗性	(214)
二、力量源于超验的现实感	(218)
三、不分裂的诗人与不分裂的诗歌	(223)
第四章 新世纪诗歌的多元审美	(228)
第一节 孙磊：诗与思的人生信仰	(229)
一、向内转的语言姿态	(229)
二、写作怎样通往一种信仰	(232)
三、隐喻美学和思想境界	(236)

四、如何审视我们的处境	(240)
第二节 宇向：朝着爱的方向，让诗来带路	(243)
一、从感觉出发的思想追索	(243)
二、深沉的底色与厚重的气质	(247)
三、诗歌自身所要求的生命意识	(251)
四、从艺术之美到良知情怀	(255)
第三节 朵渔：无欲写作通往力量之爱	(259)
一、思想性如何对接修辞	(259)
二、写作的责任和精神的难度	(262)
三、羞耻心与常识感	(267)
四、诗的终极通向爱的可能	(270)
第四节 沈浩波：如何在自信中出示活力	(274)
一、“心藏大恶”的时代	(275)
二、写作自信建基于什么？	(279)
三、如何先锋，怎样前行？	(282)
四、在变化中寻找创新的可能	(286)
结语	(291)
后记	(295)

绪 论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当代诗歌 60 多年的历程,会发现它走了一条曲折之路。从一开始的“左翼”意识形态化之路,到后来的开放与多元,期间各种诗歌风潮和诗人团体、流派轮番登场,在 1980 年代将先锋诗歌的氛围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此后,诗歌趋于沉寂,它不再疯狂,也不再“灿烂”。那些此前靠勇气和胆识写诗的人,被写进了文学史,而专业化的要求将那些荷尔蒙的青春写作抛在了时代的车轮后,技艺凸显,思想淡出,晦涩的玄学诗成为一时的风尚。但食洋不化的现实触及了诗人们焦虑的神经,他们在网络时代纷纷提出本土化的观念,然而,实践起来又是如此艰难。

汉语诗歌到底是要拥抱西方,还是要回归传统,抑或是撷取二者之精华,自创一条新路?这些摆在当代诗人面前的问题,总能引起一拨又一拨的思考与跟进。“诗歌热”不再成为可能,即便有,那也只是诗人以小丑的角色登场,引来的不仅是嘲笑和讥讽,还有他们面对残酷现实的尴尬与无奈。失望者或弃绝而下,或改换门庭,或转向他者,而那些坚守者依然衷情于缪斯的独唱,他们将个性化的书写置于大时代的席卷中,去接受考验,去面对风雨。这是时代赋予当代诗人的权利,也是诗歌这一寂寞的文体本身的处境。冷遇、苍白、偏离,最终都归结为趣味,反思的立场是根本。于是,这才有了对当代诗歌所走之路的审视,以及对诗坛“刀锋”的透视。

一、召唤当代诗歌精神

中国当代诗歌的前行之路,一直有着两条线索,一条是显性的,

主流的,一直占据着某个“安全”的位置;另一条是隐性的,有时候在场,有时候又不在场,有时从非主流变成主流,从“地下”的先锋逐渐转变成了文学史书写的对象。这似乎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学翻版,又像是“风水轮流转”的现实投射。不管在那条主流的诗歌之路上,多少人玩得喧嚣、张扬,大都不过是“应景”的速朽之作,唯有那些踽踽独行的诗人,他们偶尔闪现的灵感,那些或残酷或温情的光芒,会始终照耀着这历史并不长的新诗之路。

“十七年”时期被树立为标杆的政治抒情诗人们,他们在时代的“关照”下,既抒发了自我的激情,也迎合了某种文学趣味,这些早年进入文学史的一笔,永远都在,但它们留给后世更多的还是“批判的靶子”。虽然像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等都有着那个时代诗人的性情、政治嗅觉和敏感性,但也囿于特殊权力的召唤,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特殊个体。然而,处于隐性状态下的同龄诗人们,却走了一条潜于无闻的写作之路,他们的逐渐“被发现”,经历了一个由“地下”到地上公开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一条由边缘到中心的路径。这不是被收编或“招安”,而是先锋诗歌惯常的被“发现”方式。从郑敏、牛汉、曾卓、彭燕郊、邵燕祥、流沙河,到黄翔、哑默、林莽、多多、食指、江河、芒克等,中国当代诗歌完成了又一次现代转型,他们的过渡为先锋诗歌的更深层次探索作了铺垫。朦胧诗人和前朦胧诗人们的写作,是在那个特殊时代环境下的创造,他们没有大唱时代的赞歌,而更多时候是向内心寻找生存的希望,所以更像是在塑造挽歌时代的悲剧。悲剧一直是中国作家和诗人们关注的主题,它既是永恒的精神之根,又在压制个性的时代为诗人们找到释放的出口提供了思想支撑。因此,除了语言创造之外,对于诗歌的思想性,不管有多少人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它仍然是贯穿当代诗歌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文革”期间的诗人们,大都充当着精神受难者的角色,他们在现实中蒙羞,但在无名的写作中,他们释放了自己,那种紧张、警觉和压抑,正是诗意自然生成的契机。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诗歌,大都是有力量的,它们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下诗人心理的正常语言投射,没有多少应景的成分,也无口号和传声筒的虚假。“潜在诗歌写作”的真诚,

是那一代诗人所留下的珍贵遗产，我们无从考证，但也不能遗忘。

我们来看根子（岳重）在“文革”期间写下的《三月与末日》、《致生活》、《白洋淀》、《桔红色的雾》等诗作，仍然不过时，他的写作虽然是基于对“文革”浩劫的反思，但并没有囿于单纯的控诉，他写作的重心仍然是在探求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当危机来临，希望的破灭并不是那代人要“活下去”的障碍，他们仍然在默默地等待黎明的曙光。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诗人写下犯忌的作品，就是打破了自我闭塞的可能，克服了人生的障碍，在艺术探索中保持了一个诗人的良知。不妥协的诗人们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积存下了一批让我们至今都觉得应该“刮目相看”的作品，他们拒绝融入时代的大合唱，在私下的巨大共鸣中亮出了“独唱”的嗓音。那些经典之作我们现在读起来仍然感觉眩晕，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感动。在那个充满恐惧的时代能脱颖而出的诗人，他们的写作肯定迎合了某种趣味，青春的，反叛的，逆向的，虽有一张残酷的脸，但内心还是温和的，纯洁的，其实，“他们没那么复杂”。真实，似乎应该成为诗歌在特殊时代的唯一标准，但往往谎言遍地后，所有的价值底线都指向“不作恶”。很多诗人确实“不作恶”，但平庸的文字改变不了脆弱的现实，这个世界仍然需要强劲的创造，于是，这些诗坛“刀锋”带着自己的绝活出来亮相，目的和想法不同，行动也就大相径庭。他们中有的人是为尊严写作，有的人是为名利而来，在大一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里，他们被置于一处，接受时代的审判。

但凡有着警觉意识的诗人，大都不会在随波逐流的浪潮中湮没于平庸，他们总能在混乱的秩序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这是需要某种理想和信仰的。对语言的敬畏成了多数有追求的诗人的选择，他们在创造的世界里闯荡，横冲直撞，或在困惑中寻找“文学内部的风景”，迂回救赎。诗人的反叛一度成为了时尚，但这种反叛肯定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精神上，骨子里的。对既定价值的不认同，对固有观念的质疑，对人生的不屈服，对平庸的抗拒，都在先锋诗人那里获得了响应，而疯子、神经病等被贴在先锋诗人身上的标签并未撕掉，那已成为他们的宿命。人生与诗歌的错位，迎来的往往是一段苍凉的美学，

“黄金给了我们耳朵/我们用脚倾听/用技术整出星空的颜色/捕捉永恒的自然之声”(余世存《十月的诗》),这唯一能契合的,就是我们的内心。而当内心分裂成为一种常态,诗人就从中获得了精神的资源,幻化,冥想,到头来还是归于沉重。

这个时代的诗人们不仅仅是要和语言过不去,而且还要跟那些微妙的人生挣扎与纠结过不去,困惑是诗歌写作的内在动力,于是,怀疑和对抗意识产生。当代诗歌所走过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时间虽不长,但经历的曲折和磨难并不少,投身于此的诗人们遭遇了更多的限制、约束和嘲讽。带着悲情上路,他们中很多人仍然义无反顾。不管他们保持了多久对抗的姿态,政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它是诗人在清醒状态下探求存在感时不可多得的参照。意识形态的那张大网时刻笼罩着中国诗人的写作,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就看他们如何去利用了。困惑的写作,如同困惑的人生一样,容易进入到个体状态里,这与话语权无关,也无涉岁月的摩拳擦掌,它还是在于诗人怎样以真心去体验大时代的严峻与荒寒。

1980年代是激情的,辉煌的,“灿烂”的,而1990年代是相对沉寂的,平稳的,但在平稳中也有着潜在爆发的激流。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网络的兴盛让诗歌趋于“繁荣”,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灿烂”精神的复兴,但诗人们普遍遭遇了身份认同的尴尬,诗人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而写诗成了“地下”工作,这种反差就是新世纪的重要特点。有诗人抱怨环境不为自己提供机遇,有诗人彻底融入到了适合消费时代的“潜规则”中,有的诗人竭力拥护先锋精神和民间立场,还有的诗人从西方视野里返身回来,要保持一颗“古典之心”。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新诗与古典传统的关系,先锋诗歌该向何处去,都成为了诗人、批评家和诗歌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同时,伪问题也不断出现,但诗评家们仍然乐此不疲地去探讨与分析。遗留的旧问题刚获解决,新问题又接踵而至,我们总是在解决和困惑之间循环往复,如同对即将消失的诗意的热切挽留。

20世纪的“灿烂”诗意图确实在渐趋消失,它们被更为理性和“科学”的诗情取代,这不是方向性问题,而是美学趣味上的“风水轮流

转”。但我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诗意图，还是那些古老的心灵话题，爱恨、情仇、生死、轻重等，它们对人之心弦的拨动，是对境界的某种验证。这种诗意图的流动，也是对近百年新诗发展的一个回应，它流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生命还在延续，某种新的变化也在酝酿中。

二、尊严写作的日常化

1990年代，欧阳江河说：“90年代的诗歌写作对如何使用一个词的强调甚至对如何理解一个词的强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特征。”^①诗人准确地抓住了1990年代汉语诗歌的处境，过于强调词，也就是对语言的极端化重视，这才有了后来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诟病。不管结果如何，诗人们在1990年代的积淀、尝试和突围，都会掀起一阵波澜。对词语在1990年代的命运，王家新有诗为证：“雪将以童年的样子被记住。/中年：一条终于松开的绳子，/双手从打了死结的事实缩了回来。//雪的浪漫身子牵涉到光线变化，/哦雪，即兴风格的最后闪耀，/肖像从面孔吹拂过去，词回到词。/随着词的改变，/我们也改变着自己的肉体。/事物变轻了，词却取得了重量。”（《词语》）在这样的诗里，不仅是词在改变，诗人在中年困境中对“雪”的依赖，同样是一场灵魂的救赎。先锋实验更多是属于青春写作的一部分，而一旦越过这一阶段，诗人们的转向就是必然。他们从内心挖掘更具深度的写作，从倔强固执变得温和顺从，散文化也就成了诗歌写作的另一极美学。当诗人们不再玩狂热的语言实验了，词的力量又在何处体现？唯有内心对世事之同情的理解，方可在平淡无奇的现实里找到那一抹人生的感动。就像诗人宋琳在一次采访中说：“诗歌的自治要从抢救词语开始，重新为词语注入灵魂。不对心灵起作用就谈不上真正的影响。”^②

现在，我很少再听到有人说，诗歌看不懂了，我觉得这并不是说读者的阅读水准提高了，而是近百年新诗的变化，在审美趣味、自我认同和读者接受等各个方面有了明晰的立场。“高处不胜寒”的先锋

^① 欧阳江河：《共识语境与词的用法》，《站在虚构这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0页。

^② 张晴：《宋琳：诗歌曾经抚慰过我们》，载《时代周报》2011年1月6日。

之作,越来越有了它们的同谋,诗人之间的相轻变成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同情和爱怜。诗人朵渔曾说,不团结就是力量,这针对的是诗人多元化的表达,个性化和丰富才会是先锋诗的出路。而抱团取暖的江湖格局,仍然是诗坛不成文的规则,似乎谁也无法撼动。自己跟自己玩,不是不行,但在这样一个时代,孤独就是自绝门户,而门户在当下又显得多么举足轻重!

门户不是哪个诗人仅凭个人之力就能建起来的,它需要的是一批趣味相近、志同道合者的共谋发展。即便是风格不同,甚至连立场有别的诗人,在新世纪也能走到一起,在网络上和现实中寻找某些相互认同的契合点。臧棣说:“在我看来,沈浩波的诗,也包括伊沙的诗,他们的成功之处都在于,更新并且深化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口语和语感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写作都超越口语,且借助诗歌对口语的运用,促进了现代诗写作中对活的语言的追寻。”^①很多经历过1990年代末盘峰论争的诗人看到这一幕,都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不仅是诗在变化,人同样也在变化。臧棣和伊沙是颇有争议的两位诗人,臧棣的知识分子形象,伊沙的民间立场形象,都因各自的阵地互不搭界,之前形同陌路,当他们都坐上了自己所属阵营的交椅,也不免会产生相互的认同感。不管是友情赞助,还是刻意违心,他们能走到一起,不是宽恕心理在起作用,而是诗人们在寻找呼吸的出口。

诗人们在新世纪的握手言和,确实能从一定程度上给诗坛带来“团结”的氛围,这于人情是好事,但就诗歌本身来说,这样的和解更像是某种让步的结果。诗歌艺术精神的迁就是创造的敌人,它们对抗的直接就是个人的美学趣味:你是否在坚持永远不变的“先锋”精神?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诗人在妥协,而且是无节制的妥协,于是他们渐渐走向了诗的反面。哗众取宠只能短期吸引眼球,但绝对不是诗之大道。新诗的创造还是在于对现代性的无尽探索,这种探索不是走火入魔的极端实践,而是让创造立足于一种底气,它包括个人

^① 臧棣:《诗歌能口语吗,或口语能诗歌吗》,载《新京报》2013年7月20日“书评周刊”。

的体验、时代的病症、社会的启蒙、历史的经验,甚至是我们广阔的传统,也就是说个体写作与公共言说的融合似乎要成为诗人的一种自觉。

自觉的写作说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是有难度的。大部分人的诗作都写得“太过便宜”,缺乏一种高贵性和纵深感,总之是平淡,读了他多首诗,也像是读了一首,没有多少变化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很多诗人还是重复走他人的老路,步其后尘。诚然,诗歌的丰富性离不开多维度的探索,但不能被那些驯化的思维所限制,打破惯常的理念,不是姿态,而是行动。现在有理念的诗人很多,而具行动力的诗人太少。能常给人带来惊喜,一直给我们信任感,这样的要求在绝大部分诗人身上难以实现。这也是新世纪以来先锋诗歌的现实处境,思想的力量无法融合语言的创造,二者不能有效对接,这不是哪一个诗人的错,它恰恰是时代语境给诗人带来的割裂之困。对神秘感的不再兴奋,或者丧失了梦想的魄力,诗人的敬畏也会随之淡化,没有敬畏的写作是很难引起读者共鸣的,它们充其量也就是对机械和程式化写作的戏拟性追随。

在当下,有尊严的写作是诗人自己争取来的,不是他者赋予的权利。“真正的诗人从本质上说就是革命者。”^①先锋诗人们的革命,逐渐从1990年代前后的语言革命转向了精神革命,所以后来有人提出要重建诗歌精神。没有思想的写作,难以获得尊严,在诗歌上同样如此。不管诗人们在过去多么钟情于“异质混成”的成就感,他们对本土化的选择就是一场身体和灵魂的革命。“在远离故土的外国找到一种本地感,比纯粹的漂流更怪诞。”^②这是去国诗人杨炼的感慨,这一复杂的心理让很多诗人失去了方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不断的向内转,在异域写古典和传统之诗,这种格局和境况并非怪诞所能概括,要靠记忆嫁接历史和现实,诗人有时是要颠覆自己的过去的。

^① [法]伊沃纳·杜布莱西斯:《超现实主义》,老高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1页。

^② 杨炼:《本地中的国际》,《中国诗歌评论——细察诗歌的层次与坡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